

世界客商研究文丛

林碧红 主编

客商概论

闫恩虎 著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客商概论 / 林碧红主编. —上海: 文汇出版社, 2009. 10

(世界客商研究文丛)

ISBN 978 - 7 - 80741 - 682 - 1

I. 客… II. 林… III. 客家—商业史—广东省 IV. F729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9)第 164288 号

客商概论

世界客商研究文丛

出 版 人 / 桂国强

丛书主编 / 林碧红

作 者 / 闫恩虎

责任编辑 / 乐渭琦

特约编辑 / 潘颂德 汪义生 李 亮 冯 凯

装帧设计 / 周夏萍 陆 及

出版发行 / 文汇出版社

上海市威海路 755 号

(邮政编码 200041)

经 销 / 全国新华书店

照 排 / 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

印刷装订 / 上海市印刷二厂

版 次 / 2009 年 10 月第 1 版

印 次 / 2009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 / 720×960 1/16

字 数 / 280 千

印 张 / 20.25

书 号 / ISBN 978 - 7 - 80741 - 682 - 1

定 价 / 98.00 元(共两册)

编委名单

顾问 刘日知 李 嘉 陈小山

主 编 林碧红

副主编 丘 峰 谭元亨 郭文烈

编 委 林碧红 丘 峰 谭元亨

杨宏海 曾永祥 郭文烈

管 雅 房学嘉 钟伟光

序

刘日知

南洋民谚“客人开埠、广人旺埠、潮人占埠”，鲜明而又生动地反映了在中国东南沿海地区演绎的海洋商业文明中，客家人扮演着重要的角色。客商在中国海洋商业文明史上，具有无以替代、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。只要涉足客家文化，就会被客商巨贾的一举一动所感动——客商早早拓殖海外，迅速接受自大航海时代以来的现代商业理念，成为了近代中国民族工商业的先驱。

研究者发现，近代粤商第一人就是梅州人张弼士。正是他，迅速从“红顶商人”演变为民族经济的先驱。他下南洋，办实业，当外交官，又搞航运，回国开铁路，最后，创立了百年不衰的“张裕葡萄酒”著名品牌，并身体力行地支持孙中山先生所领导的民主主义革命。这一例证说明，客商在国内、在东南亚乃至全世界，均能纵横捭阖，恣意驰骋，引领潮流，无愧于这样一个在千年大迁徙中历经磨炼、并在近代迅速崛起的移民族群，亦无愧于这几百年间风雷激荡、百舸争流的人类发展最迅猛的伟大时代。

梅州，作为世界客都，崇文重教早已声名远播。梅州，作为客家人衍播海外的主要出发地，崇商重企也深有体现。最近几年，我们在实施“文化梅州”的战略过程中，深入开展客家研究，无论从个案出发，还是从整体而言，客家人的“崇商”并不亚于“崇文”。“崇文”与“崇商”兼备，也许是对客家文化的一种新认识。因此，在首届世界客商大会召开之际，我们深感有责任主持出版一套系统研究世界客商文化的丛书。

出版《世界客商研究文丛》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。在短短的几个



月,我们组织有关专家、学者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精心的编纂,先行出版了《客商概论》、《客商人物》。书中选材既通俗易懂,又不乏学术品位,基本实现了我们出版的初衷。丛书通过对客商的业绩、历史,尤其是其形成发展的机制,加以认真全面的梳理和研究,发掘提炼了近代以来客商所具有的商业文化精神,为推动客属地区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,抓住机遇,扩大开放,深化改革,实现经济腾飞和社会发展,提供了精神支撑和强大动力。

这一丛书,对客商这一经济现象进行了理论上的概括与思想上的提升,以多维的视觉系统地研究了客商精神的基本要素。尽管理论上还有不尽人意之处,但足以启迪后人少走弯路,更好地面向未来,更快地迈向成功之巅。因为,理论的指向永远是未来而不是过去。

这一丛书,上溯到近代乃至近古的客商人物,遍及了海内外,揭示了客家人不拘泥于传统“仕农工商”的排位,深知“裕国通商”的道理,奋力于实业报国、实业兴邦。这一来,无疑对弘扬客商精神更具有史诗般的意义。

改革开放已满30个年头,中国经济正面临新的考验,国际金融危机给我们带来严峻挑战。如何化危为机,信心百倍地迎接这一轮挑战,对于具有后发优势的客家属地、客家人及客商而言,无疑是对其胆识、智慧与才干的考验。但愿这套“客商丛书”在这历史的重要时刻,即时发挥出它的激励作用!

是为序。

(本文作者系中共梅州市委书记、市人大常委会)



历史投影与未来构想

谭元亨

一

在广东省委组织的一套关于改革开放30年我省文化建设的丛书中，客家人被认为同样拥有海洋文化精神的观点，视作这30年间思想解放、深入研究的一个重要成果，这也是对传统文化下对客家文化认知的一个新的突破。毫无疑问，时至今日，这已经成为一个历史共识。

海洋文化精神，概括起来，集中在两点上。一是拓殖海外。客家人在南洋一直有“客人开埠”的盛誉，正是这一条的最好印证。而梅州，更是著名的侨乡，数以百万计的客家人，遍布了亚非、欧美。“凡是有咸水的地方就有客家人”，无论这句话中，是苦涩还是欣慰，所说的却是一个无可颠扑的事实。第二点，则是商业文明。西方，尤其是美国，讲的是“以商立国”，且迅速成为海洋大国。而我们，自古以来，强调的却是“以农立国”，连游牧出身的大清王朝，入主中原后，也遵照历来的传统，皇帝每年都得做一次“秀”，亲自下乡，装模作样扶住犁耙耕田，以示对农耕之重视，祷告上苍，这一年当风调雨顺。所以，士农工商，商为末业，不仅不被重视，还多加限制，并让人瞧不起。唯有东南沿海，远离中央政权，2000多年来颇受海上丝绸之路的濡染，“忧贫不忧道”，走的是“通商裕国”的路子。虽说没敢称“以商立国”，可当年重用改革家王安石的宋神宗却说过，广东过去是“笼海商得法”，方富可敌国。而宋代的商业之发达，则居当时世界之首。后来的历史学家每每不胜浩叹，如果没有崖门之役，宋代商业文明发生中



断,中国就有可能发生商业革命,比西方更早进入资本主义。

当然,历史没有如果。

如此,客家人的商业精神,是“与生俱来”的呢,还是后来到达东南沿海受有地域上的文化影响,才渐渐形成的?

说“与生俱来”,则是,正当整个国家的商业最为发达之际,客家人也正是这时脱颖而出的——目前一般的共识,是认为客家人形成于两宋之际。所以,形成时,便带有宋代的商业文明的历史印记,商业精神自然也就是从诞生的那个年代带来的,这不无道理。

说后来受新的移民地域文化影响,也论据充足。无论他们怎么后来,又怎么只能住在山里,所谓“无客不住山,无山不住客”,但新的地域环境,以中原视角来看,也仍是在东南沿海,在“海边”——哪怕离真正的海岸还有几百里,当年,章太炎也是凭此认为客家人同属海洋文明一族的。虽然以广府人的视角来看,他们来自中原,来后照旧在“耕山”,而且儒家文化的色彩又那么显著,归入海洋文明一族,多少还得打几分折扣,虽然他们后来也漂洋过海,那也是生活所迫,并没“开海”的自觉。所以,“后来的影响”,才是客家人拥有海洋文化精神的根本原因。

虽说提出客家人同样拥有海洋文化精神的“始作俑者”是我,但对人们就此提出的这两大争议,一直未曾有过正面的回应。藉此就这套“客商丛书”编纂之际,结合几本书的相关内容,来个追根溯源,以回应上面的问题。

二

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,同样,也是精神史。人们常说的“正名”,首先便是精神上、意识上的认可。对客家人的海洋文化精神的“正名”,更是如此。

怎么“正名”,则是要“名副其实”。“实”又是什么?那便是客家人的历史事实。只有这一历史事实,方可证明客家人所拥有的海洋文化精神:这便叫“循名责实”。几千年来,中国人的名实之辩,从来是回避不了的。

所以,若要正名,则须溯源。



怎么“溯源”呢？

坦率说，早些年间，我在做十三行的研究时，并没有把客家商人考虑在内。作为十三行行商的后裔，自是深受周围环境的影响，认为这仅仅是广府人与福建人（福佬）惨淡经营的事业。当然，十三行的历史意义在于，在那样一个大航海时代，中国行商所拥有的气魄，所具有的历史能量——不仅仅指财富，在世界上令人咋舌。尽管清廷允诺广州“一口通商”，但仍制订了中国商船大小尺寸的限制，让中国商船造得很小，无法出洋“通夷”，可他们却敢背着清朝政府，在欧美的大帆船买下了股份，成了不少“外船”最大的股东，争取最大的利润。他们不仅仅是海上贸易的商业巨子，而且同样是国际金融业的巨子，他们买下美国等多国的国债，还投资横贯美国东西的太平洋铁路与其他大工程……十三行鼎盛之际，中国的GDP占有全世界的32.4%，近三分之一，比今天美国占世界的比例要大得多。“通商裕国”这一理念，正是与十三行同时发生的。

只是，我一直没与客家联系到一起。

直到近年，我才在浩瀚的资料中发现，十三行商人，不仅仅有广府人、福建人，也同样有骆姓的客家人，甚至有当时的“官商”及满族人。

不过，我仍纳闷，远在粤东山区的客家人何以会出现在十三行商人的行列中呢？

当年，在《客商》一书中，我曾这么写过：

笔者正在做“十三行商人”的研究，曾富可敌国、名列当时世界首富的十三行商人，却是在鸦片战争之后，立时败灭，不是破产倒闭、便是流放充军，但更重要的原因，则在于“五口通商”，以及上海、香港的开埠。无独有偶，驰名全国的晋商、徽商，也几乎同时走向了没落，晋商的没落，是因为威名赫赫的山西票号，无法与现代的商业银行相抗衡，咸丰七年，英商麦加利银行设分行于上海，票号也罢，钱庄也罢，统统寿终正寝了。而徽商的衰亡，一说是缘起于陶澎在两淮实行的“改纲为票”，令暴富的盐商（徽商的主干）纷纷破产；二说则因太平天国于徽州与清军打拉锯战，兵荒马乱，徽商自身难保。然而，被称之



为“红顶商人”的胡雪岩，作为徽商最得意的人物，恰巧在乱世中如鱼得水，聚财千万，名满天下，直至1883年才步入穷途，沦为钦犯，抄没家产，未得善终。其以“官商”发迹，亦以“官没”而终了，其荣其衰，恐怕与十三行商人财灭的主要原因之一，即亦官亦商分不开。

故清中末叶著名思想家郑观应所断言，官非但不能护商，而只能害商。也许，正是有这么一位思想先导，粤商在晋商、徽商陆续败灭之际，不仅把持住自己，还能及时转变观念，由“红顶商人”向民营转换，适应历史潮流，继续在商海中充当弄潮儿，从而一直经清末、民国，发展兴盛起来。

一说粤商，人们大都知道是广商，还有潮商。潮商，大抵与闽商不分彼此，因为潮人一般被视为“福佬”，本也是福建过来的。名闻天下的十三行商人，便是由广商与闽商组成，闽商其实有相当一部分为潮人。其时，没有客家商人——他们后来才成为粤商三大组成部分之一，因此十三行走向衰亡时，客家人，作为整个民系还没有真正崛起，世人知道客家，大都是因太平天国，而太平天国兴起时，十三行早已烟灭灰飞十多年了。后起的客家人，跻身于商界，并不为人看好，毕竟他们农耕文化色彩更重一些，且历来有重文轻商的顶尖人物，竟会是客家人，而且是“红顶商人”过来的。客家人重视仕途，“红顶”不足为怪，可经商能摘冠，却未必让人相信。然而，近人在《十大商帮》等书中，拿出来作为粤商的第一号代表人物，不是广商，也不是潮商，却是地地道道的客商。这个人，便是张弼士，他先是靠诚信，勤俭创业，从当帮工开始，开商行，办矿业，成为粤商中首屈一指的巨商，而后，亦商亦官，入仕途，先后任清廷驻槟榔屿（这是客家人在海外最早的聚居地之一）领事、新加坡总领事等职。他先后投资兴办粤汉铁路、广三铁路，特别是创办了山东烟台张裕酿酒公司，成为“中国葡萄酒之父”。^①

这段文字，显然带有某种武断，虽然后边仍讲到，后来作为粤商的翘

^① 谭元亨《客商》，人民出版社，2008版，第260—261页。



楚,不是别人,却恰好是客家人,是大埔出去的张弼士,虽然他是“红顶商人”——这对客家人来说,不足为怪,因为重仕途是他们的传统,“可经商能摘冠,却未必让人相信”,可张弼士“亦官亦商”,最后,仍回归为民商,则是历史的真实。

毋庸置疑,张弼士同样是来自粤东山区。而粤东山区成为侨乡,则应在他“出山”之前,这一点对我而言,也仍是个谜:是怎样的历史原因,让这样一个深藏在客家腹地的山区,居然会同沿海的三邑(南番顺)、五邑(今江门所属县)一样,成为南方著名的侨乡呢?海边的县市成为侨乡,这顺理成章,可山区成为侨乡,则匪夷所思了。

幸好不久,在研究十三行的“前史”时,我终于又有了一个重大的“发现”,那便是明清之际,在粤东山区“沉积”了不少“海匪”或“海盗”。

的确,长期以来,我一直纳闷,以“耕山”著称,稻作文化兴盛的客家人为何在远离滨海的山区——梅州,却出了一个海外有 300 万华人华侨的侨乡,可与珠江三角洲上的五邑媲美。在主编《客商》一书之际,黄启臣教授专门为此书写了“明清梅州客商”一章,其中提到,早在明朝嘉靖年间,程乡(今梅州)就有商人林朝曦等人,与饶平的张珪结盟,自号“飞龙主人”,先后在粤闽交界经商,万历年初,林、张二人更到三佛齐(马来半岛)贸易,列肆为番人舰长。

而这仅仅是个案。

这回,却在光绪《漳州府志》中读到:

中丞阮鄂帅兵讨倭,倭走南澳,乱民从倭者,集梅岭,从万家。众议往屠之……中丞曰:其在浙、直为贼,还梅岭则民也。奈何比歼之。

不由得大吃一惊,“集梅岭,从万家”,是何等规模。

这终于消释了我心中的疑团。因为凭此,已不难解释梅州今日为何会成为著名侨乡的历史原因了。

原来,我曾认为十三行行商只是广、潮(闽)人,后来又听说有骆姓的



客家人,但始终将信将疑,现在看来,应该不存疑义了。

须说明的是,过去一般视“倭”为日本人或在东洋行凶的海盗——当然是中国人,如我们解决了“亦盗亦商”的认识,便能明白,为何中丞认为他们“还梅岭则民也”,不可以“贼”、“盗”讨之。而这里所说的“梅岭”,则是指粤东至粤北一道,并非梅关古道那一段。

可见,“集梅岭,从万家”,当是重返那里的客家商人,这与嘉靖、万历年间,客商活动于粤闽交界处,后来更至三佛齐做海上贸易,甚至当上了番人的舰长——这与后来十三行行商当外轮的大股东已经太接近了。

三

这一来,不少谜团也就解开了。

所谓的“海盗”,在历史上,每每是海商,因为,一开海,盗即为商:一禁海,商亦为盗。二者身份之变换,在于“开”与“禁”。众所周知,自从元朝首开了禁海的恶劣先例之后,明、清二朝,时而开海、时而禁海,反复了不知多少次。既有郑和“七下西洋”的辉煌,又有清初禁海“内迁五十里”导致数以百万计的海民背井离乡、死难无数的惨绝人寰的大悲剧。

而郑芝龙、郑成功建立的“金厦帝国”商贸基地,正是在这反复的开与禁中形成的。这个基地,货殖五洋,富甲天下,并凭此,一举收复了为荷兰人所侵占的台湾。当时郑芝龙的称呼,便是“郑一官”,与后来在十三行中称行商为“潘启官”、“谭康官”是一致的,这应是闽南人的叫法,但十三行就沿袭了这一称谓,可见,金厦帝国与十三行分明有某种联系,而且同是对外贸易的基地。

就在郑成功的队伍中,有着约三分之一的客家人。他那著名的副将刘国轩,就是客家人。

因此,当郑成功失败后,他的部下,尤其是大量的士兵,潜回内地,沉积到了粤东山区,势在必然。

而且,在郑氏之前,活跃在东南沿海的海商——海盗中,就有林凤等一批客家人——也就是说,至迟在明代,客家人在海上经商,也已经非常



活跃了——而这,与客家族群形成的两宋,相去并不太远,只隔了一个只存在不到一个世纪的元朝。

而客家人大规模涌进粤东,则在明朝。我们从黄启臣整理出的“明清部分客家帮商人列表”中,亦可以看到,还在16世纪初、中期,明嘉靖年间,就有好几位“经商闽粤沿海”的来自大埔、梅县的著名客商:林朝曦、肖雪峰、萧雪峰、罗袍等。

我们甚至可以找到,康乾嘉年间,便有罗芳伯、丘燮亭、姚德胜、吴德馨、张振勋等客家人在加里曼丹、巴达维亚(今雅加达)、爪哇、马来亚等地经商。这与十三行时期,可以说是完全同步的。

而后,便是张弼士这一代,从清末衔接到民国。紧接着,便是胡文虎等,一直到今天的田家炳、曾宪梓,以及现在活跃在香港的一大批中青年杰出的客商。

这一来,我们便已经大致勾勒出了自明代开始,一直到今天的整个客商历史演进的脉络,当然不是很详尽,但已经相当清晰明了。

同时,我们亦可从客家人“耕山”的经济产业,看到其“外向”的端倪。在明末烟草传入中国之前,客家地区的支柱产业,先是木材的生产。毕竟,山中最丰富的资源乃是木材,粤东开发得晚,原始植被未被破坏,木材当是首选,故史志中有称“终岁伐木作柴,连轳载至府城(潮州,早年嘉应州并未划出来)售卖,其大木可作栋梁者,连数百枝为群板,运至蔡家园贸易,多获厚资”,这也是客家人从商的主要出路。还有是造纸业,这是木材业所推动的。宋代,南雄的纸业已颇负盛名,而后发展到了粤东,长乐(今五华)县的造纸行业便后来居上。而粤东仅次于龙川立县的兴宁,更有“无兴不成市”的美誉,人们不难发现,兴宁的四大行业,与纸则分不开,即笔、墨、布、扇,如刻书业,还有土布生产,形成了纺织产业,以至被纺织界称之为“纺织之乡”。

由此,亦可以看出,即便是宋代——即客家形成之际,其造纸业便已兴盛起来,这与一个族群的文化素质还是分不开的,这还可以联系到客属地闽西的四堡雕版印刷。可以说,客家人的“耕山”,便已经有与商业联系起来的意识了,否则,不会在客属地有“无兴不成市”的谣谚出现。所以,



说客家人“轻商”，多少有一些偏颇。因为整个中国文化的旧传统中，轻商的定位是不移的，相对而言，客家人的“轻商”还没那么严重。所以，他们与沿海广府等族群的接触，也就较快地接受了这里的海洋商业文明，走出了自己发展的一条路来。

到此，我想我可以回应开篇中提出的问题了。

客家族群形成于宋，而宋代则是中国古代商业文明发展得最大也最健康的一个朝代，在这个意义上，客家人“崇文重教”孕育于中华大文化之中，是“与生俱来”的，同样，客家人的商品意识，也是与其诞生的朝代相一致，亦可谓“与生俱来”。

但是，这一“与生俱来”的商品意识，与南方，尤其是广东上千年来业已孕育出来的商业文明，也还是有一定的距离。所以，他们迁徙来之后，仍需不断强化自己的商品意识，努力向外拓展，方可以与其他族群并驾齐驱。因此，强大的海洋文化精神，也仍在不断孕育、影响客家人。因此，到了近现代，他们才在各个方面，迅速崛起，以民族资本，支持了推翻千年帝制的民主主义革命，后来，更支持了国际反法西斯战争，更为中国的复兴，立下了汗马功劳。

这样，把两个不同的观点，有机地糅合到了一起，更为完整、更为全面，也更雄辩地论证了客家人所拥有的海洋文化精神。追根溯源，为客家人的海洋文化精神正了名。

四

其实，追溯过去，不仅仅为的是“正名”，正客家人同样有海洋文化精神之“名”，正客家人一般“重企”、“亲商”之“名”，正客家人与时俱进、敢为人先之“名”，更重要的是，要给未来开拓一条更开阔的道路，无负已有的光荣与盛名，在 21 世纪更高地屹立。

历史给现实的投影，从来就是未来的构想。英文中的 project，就包含有“投影”与“构想”的意义，可以说，中文这样的两个词，在英文中是一个词，亦是同一个词义。因此，我们追溯客商的历史，正是要把这一历史投射到今天，并成为我们构想未来的重要因素。



那么,我们从客商的历史中,能把什么投影到今天呢?

而这一投影,又与今天有什么必然的历史和逻辑之一致呢?

首先,我们看到的是,过去的客商,相当重视与文化相关的经济活动,正如前边所提到的,如造纸业、刻版业,以及延伸到纸、笔、墨、砚“文房四宝”,还有纸扇、通书之类,到了后来,更出现了侨批业、交通业(如铁路、海运等),以及打造品牌(如张弼士的张裕葡萄酒品牌),这期间,文化的意义、知识的含量日益增大。一直到现代、当代,我们从客商的研究中,亦不难发现,他们愈来愈重视文化的附加值,愈来愈注重品牌的打造——而这,则更要倚重于人才的发掘与培养。人才本身,天然地与知识经济相近、相亲,难解难分。中国的现代化进程,发展到了今天,更是在拼知识、拼信息,归根到底,便是拼人才,拼有创新意识、拥有丰富知识的人才,尤其是走出工业社会之际,更给高端人才以广阔的天地大展拳脚。

正是客家人深厚的文化底蕴,崇文重教的历史传统,使他们能及时体会会到,资金与文化,孰轻孰重。当不少商人在浩叹“穷得只剩下钱”而茫然四顾之际,他们已意识到,文化乃是重中之重。文化与历史是密不可分的。一如“五四”运动的先驱许德珩的名言,过去的文化是历史,今天的历史是文化。文化为历史所决定,一个企业的凝聚力,则在于文化,因为文化又决定了未来的构想。这是一种思维方式,并决定了或左右着这样一个族群以及具体到一个企业的走向。企业每每跟不上市场,不是别的什么原因,而在于企业文化模式。我曾举过这样的例子,中国人每每好家族式经营,客家人也不例外,子贤则业旺,子衰必业败,所以,如不到一定时刻,“杯酒释兵权”,斩断经营上的血缘纽带,任人唯贤而非任人唯亲,势必重蹈“富不过三代”或“君子之济,五世而斩”的历史宿命论。而今,不仅军事上,从冷兵器转到热兵器,更演进为信息战的年代,在经济文化上,也同样如此,一位客商或实业家,眼观六路,耳听八方,既能宏观着眼,更能微观着手——从宇航到纳米技术,同样都是尖端。

以知为本,诚信为道,后者,似乎是儒家伦理文化的体现,其实,我们今天已经看到,世界上那些“以商立国”的发达国家,恪守的更是商业上的诚信,诚信比生意更重要,诚信才是真正的无价之宝,所谓“厚德载物”,便



是诚信的德行,方可承载得起这整个世界。以“仁”取天下,天高“仁”为峰。

同样,我们都看到,过去被视为“穷山恶水出刁民”的客属地,山不再穷,水更不为恶,民也绝对不“刁”——其实,这“刁”的意思另一个读法,当是机智、聪明。如今,几乎所有客属地,都成了旅游的名胜之地,从赣南、闽西到粤东,不仅仅是红色旅游的旺地,更是名山、大川生态旅游的好去处——平心而论,这方面的开发,在客地仍只能算是刚刚开始。在发达国家,第三产业占 GDP 的三分之二,而我们,大致是三分之一,只及人家的一半,可见仍大有用武之地。由于客地地处偏远,未能赶上沿海第一波的大开发、大腾飞,从而积蓄了无可估量的后发优势:生态环境保护良好,不曾遭到大的破坏,绿色经济蓄势待发,前程无可限量,这样,为今后跨越式的发展,提供了绝好的商机。

当然,第三产业比重的翻番,不仅仅在于生态经济上的优势,这也同样附之于高新科技,附之于文化的提升。诸如循环经济、诸如文化产业,都有不少潜力可挖。而当前的“双转移”又当如何把握,乘势而上,不再错失新一轮的大发展,都是值得我们认真思量的。今后,绿色 GDP 的比重,只会愈来愈大,风物长宜放眼量,切切不可急功近利,舍本求末!

一如我说过的:

客商也同样是有历史底气的,他们在近代出了那么多富甲天下的杰出英才,从姚德胜、张弼士,到邓文钊;从田家炳、曾宪梓,到今天活跃在全中国乃至全世界的客籍企业家,他们为民族经济的腾飞立下了汗马功劳。可以预期,在不久的将来,他们会以更大的业绩轰动这个世界。

客商的崛起,自是历史的必然。^①

的确,无论从知识经济,还是从生态经济——这两项直指未来的全新

^① 谭元亨《客商》,人民出版社,2008 版,第 278 页。

经济,客商都具有不言而喻的优势,自会导演出有声有色的一出历史壮剧来!

五

我们可以这么说,《世界客商研究文丛》其中的一部分,是彰显历代客商的业绩,揭示他们艰难奋斗、玉汝于成的成功历程,这自然是一种“投影”,把他们的历史足迹镌刻在今天的金榜上,起到一个启迪后人、磨砺意志、振奋精神的作用。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,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、不同的层面上,汲取他们的经验、智慧,尤其是那种坚忍不拔的创业精神,更深刻地领悟“客人开埠”的文化内涵与历史厚度,从而去开创一个可信的未来。

而本书的另一部分,则努力从理论层面上,去构建客商的价值观、人生观,以及经营理念,人格操守,寻找他们获得成功的内在规律。当然,这需从大的时代背景、族群文化,以及区域环境诸方面入手,切中肯綮,让人信服。因此,这一建构,亦是历史之投影,让这投影成为最可靠的一面镜子,从而矗立起未来的参天大厦。当然,理论的探索,总是无止境的,不可能一蹴而就,当留下更开阔的空间以期深化与发展。客商大会,其意义不仅仅是对历史经验的总结,文化传统的弘扬,即过去的指向,更重要的是,面向未来,为了未来,凝聚起一个整体的力量。历史与未来是割不断的。我们过去总是说,凝聚起历史的力量、文化的力量、族群或民族的力量,似





只有对我们这个族群——客家人的坚信，我们今天才可能走到一起。

只有对我们的国家、我们中华民族的坚信，我们今天才可能走到一起。

同样，也是对世界的坚信。

在千年大迁徙中走过来的客家人、在数百年搏击于海洋风涛中的客商，正是这么认同了自己的身份，认同了自己的责任，同样，认同了同一个未来！

当我们同样认同了客商亦是“革命的因素”之际，这便注定为中国的改革开放、客属地的经济转型与腾飞，铺出了一条坚实牢靠的跑道。

知识为本，人尽其才；
诚信为道，物畅其流。

约 300 年前，一位客籍举人，也是诗人、学者的李坛，曾满怀热情地对当年欲开国门、“大开理蕃”、迎接大航海时代表述了极大的希望，他在诗中是这么写的：

尔来太平越百载，
海气净扫无秕糠。

好一个“海气净扫无秕糠”！他对于海洋上吹来的开放之风，是何等激赏，多么肯定！可惜，当年他却未能如愿。

而今天，我们当欢呼，海洋文化在中国、在广东、在客属地，当如“横扫千军如卷席”，涤荡去所有的“秕糠”，带来一片知识的茂林、生态的净土，实现其“通商裕国”的美好愿望了！

(本文作者系广东省政府参事、华南理工大学教授、客家文化研究所所长)